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曹守亮

[摘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发展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毛泽东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学习和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总结,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及计划等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这些探索对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3)10-0019-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解读,也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利弊的总结反思,更多的是在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理论提炼和思想升华。这些认识既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成绩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遭遇挫折和失误的重要理论渊薮。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局限,很多正确的认识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被误读、被庸俗化,甚至被他本人抛弃,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思想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渊源。

## 一、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曾设想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在中国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

转变问题。<sup>[1](pp.316-317)</sup>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的问题。<sup>[2](p.175)</sup>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不仅纠正了自己以往的认识,而且还在多个场合批评了急于求成的简单化倾向和机械教条的本本主义倾向。“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sup>[3](p.872)</sup>这些简单化倾向直接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平均主义做法,引起了同农民关系的紧张。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毛泽东基本上赞同斯大林提出的三个标准,但同时又认为这些标准不具体,尤其是没有对实现这些标准的办法和形式作出富有操作性的规定。

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sup>[4](p.77)</sup>毛泽东在这个问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课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12ADJ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曹守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的反复思索和再三斟酌,反映出他在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问题上所费的心血。紧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sup>[4](p.90)</sup>“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像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sup>[4](p.258)</sup>“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sup>[4](p.296)</sup>在这些阐述中,毛泽东尽管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也已经对当时的许多做法给出了明确的判断,反映出了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

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7月还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sup>[5](pp.549-550)</sup>这是毛泽东在抽象地论述发展生产力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意义。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将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缩短为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标志是“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虽然写入了会议的决议中,但毛泽东对这个时间心里是犯嘀咕的。这个决议是导致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政策依据,而其背后对社会主义建成时间的认识则是其理论根源。事实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更侧重于将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形式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毕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毛泽东还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也制定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实现6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基本

上消灭了阶级及人民群众觉悟大大提高。<sup>[6](p.142)</sup>这一标准很容易将生产力排斥在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据此,毛泽东试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社会主义,自认为找到了斯大林没有找到的“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适当形式”。<sup>[4](p.66)</sup>不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等重大挫折,这促使毛泽东在数年之中又作了大量的思考,随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识认识的逐渐深刻,他的社会主义设想也不断得到校正和丰富。

1958年11月,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sup>[4](p.70)</sup>1959年12月,毛泽东又指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sup>[4](pp.259-260)</sup>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分阶段的思想正在逐渐成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sup>[4](p.296)</sup>在1959年的毛泽东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代表的生产力大发展就算是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其长期性和艰巨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指出:“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碰了钉子。”<sup>[7](p.277)</sup>连续不断的经验总结,让毛泽东再次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随后他在1961年开展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的活动中,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并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sup>[8](p.2148)</sup>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sup>[9](p.349)</sup>在毛泽东的要求和批准下,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交的书面报告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回忆1960年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又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sup>[7](pp.301,302)</sup>“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sup>[17](p.303)</sup>毛泽东从总结“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教训中认识到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认识到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客观性。这是由发展生产力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的。这一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的问题上由单纯地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开始向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关系转变。

## 二、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看待矛盾的历史作用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既有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探讨,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指出了苏联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无矛盾认识的问题所在。他说:“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

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力。”<sup>[4](p.273)</sup>这一认识是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规律出发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性探索,反映了毛泽东在理论上贯彻辩证法的彻底性。

1960年,毛泽东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他说:“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sup>[10](p.800)</sup>“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sup>[4](p.341)</sup>这些矛盾从本质上是生产关系领域不同冲突的具体表现。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承认矛盾的同时,又对中国的矛盾作了夸大化的处置,成为中国在其后20年所犯“左”的错误的重要理论原因之一。这些正确认识“后来未能得到坚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关系”。<sup>[11](p.417)</sup>这从理论上反思了中国犯“左”的错误的原因,也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毛泽东最初探索的价值;后来实践中的反复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从本质上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1959年12月,毛泽东从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出了生产关系要先于生产力变革的规律性认识。毛泽东将这一认识上升为普遍规律,指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sup>[10](p.571)</sup>

1959年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



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sup>[3](p.894)</sup>在毛泽东看来,当一定时期,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说:“所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生产力的性质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sup>[4](p.172)</sup>“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sup>[4](p.216)</sup>具体到生产关系的调整,1961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sup>[8](p.2152)</sup>毛泽东也坦言他本人注意到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也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存在着许多的盲目性,生产力的重要性没有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上固定下来。毛泽东的“需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sup>[3](pp.916,917)</sup>确实乃是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的痛定思痛之论。毛泽东开始尝试着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是他研究的突破口。

### 三、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问题,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人们并没有弄清楚,以至于随着人民公社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出现了违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做法,其中以“一平二调”和“共产风”最为典型。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批评,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谈到了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重要性:“现在我们

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sup>[4](p.39)</sup>这一阐述将教条主义危害暴露无遗,同时也使很多人在中国要不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问题上吃了定心丸。毛泽东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sup>[4](p.40)</sup>毛泽东在这里紧密地将理论与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强有力地批评了将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本质的教条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从中国国情出发估计了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阐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工作会议上指出:“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不能混为一谈”,“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sup>[2](pp.435,439)</sup>毛泽东结合斯大林的理论认识作了进一步分析:“‘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sup>[4](pp.49-50)</sup>历史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也就能够对当时存在的商品经济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

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sup>[4](p.48-49)</sup>对比中苏在发展社会主义上存在的差距,也使得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不言自明。

基于此,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才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会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大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sup>[12](p.100)</sup>这一认识对于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时代性和长期性有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即商品经济的认识,在当时发挥了统一思想的作用。李先念1958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和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指出:“前一个时期,有人说银行要消亡了,行长要转业,货币和价值法则都不起作用了,这些都是错误的。通过会议的讨论,现在算是明确了,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货币都必须存在,按劳取酬还是必须遵循的。”<sup>[12](p.101)</sup>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消灭商品、取消货币、无视商品价值交换原则等认识是有着一定的基础的,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毛泽东廓清迷雾、统一认识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探索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认识,花费的时间更长,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sup>[13](p.844)</sup>近30年的理论探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毛泽东最初探索的难能可贵。应该说这一理论认识是正确的,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共识。因此,这成为“共产风”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四、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十年总结》的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作了总结。<sup>[8](p.2047)</sup>其中对“大跃进”中炼钢指标的分析,反映出毛泽东对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盲目性的认识。他指出,尽管经过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的讨论,但“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sup>[14]</sup>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盲目性仍然与没有做好计划有着必然的联系。毛泽东还对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基本估计:“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sup>[14]</sup>这个盲目性,并不仅仅是有无计划的问题,而且还是计划是否符合国情、具有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看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通过调查研究不断认识规律、接近真理的可能性,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还对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对苏联计划工作作了反思。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是苏联的计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法则,这在毛泽东心里是打了问号的。他指出:“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们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sup>[4](p.32)</sup>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

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sup>①</sup>对比中苏两国在发展国民经济时所掌握的平衡规律,毛泽东对计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认识到计划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就能做到有计划掌握好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谈到了计划问题:“大跃进的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sup>[3](p.884)]</sup>对比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认识,他对计划的认识显然不够深刻,没有将其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分开来,这是其认识上的局限。

鉴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十年总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毛泽东撰写的《十年总结》这一珍贵文献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中国十年中发生许多重要事件。《十年总结》,反映出毛泽东对及时总结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高度重视和历史自觉,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递进历程,分析了这个历程的得失利弊,并引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sup>[15](p.568)]</sup>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的又一个思想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从局限性和总结失误教训的角度阐述居多,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探索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陷于空想,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具体分析的观点。从正面阐发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价值,应该成为一个值得下大力气关注的研究领域。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是得失两存之,所

以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也是正确与失误同在,成绩与错误并存。这一探索所具有的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毛泽东——引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探索,确实为后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sup>[16](p.77)]</sup>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既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来自对他国经验与教训的批判吸收与借鉴,更是以这两类认识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照、凝练和升华所得。它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于深刻理解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另一方面又直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Z].内部资料,1998.
-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6]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9]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Z].内部资料,1998.
-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 [12]《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14]毛泽东.十年总结[J].党的文献,1992,(3).
-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16]梁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美 景

<sup>①</sup>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4页。



**The Chinese Dream: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The history of the over 90 years eve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the quest for the path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lso, the quest for the Chinese Dream, the greatness of which has been nursed by the difficulties. Leaders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have hoped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has been the universal ques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f the last century. Although there is a disparity between the outlooks of them for the orientation, object and focus of the Chinese Dream, it is the universal ideal of them to enrich the country, rejuvenate the nation, enable the people to live a happy life, and realiz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aders of different time may hol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hinese Dream. That is because as far a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is concerned, there is a broad approach as well as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SHI Zhong-quan)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ic Leap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by Mao Zed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and Rathe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s the economy in the Old China, which was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was a misshapen one, to realize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ould be a daunting task.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Party leaders enclosed around the core of Mao Zedong led the people to make an tough quest and effort, cleared the residue of the misshapen economy in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of the Old China, and established an dependent and rathe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at great feat was a significant result of the quest by Mao Zedong for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step from the backward rural economy to a socialist industrial ec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path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ENG De-rong)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erequisite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Laid by Mao Zedong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the appraisal of Mao Zedong since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through his exceptional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his dissertation giv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erequisite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laid by him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start-point, to inherit the valuable heritage of Mao Zedong with an aim towards internalization by heart and externalization by action would be of great historical relev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hinese dream, that is,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IAN Ju-jian)

**The Exploration of Socialism Theory By Mao Zedong during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in the 20th Century:** Late in the 1950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uffered a major setback. Mao Zedong began to explore socialism theory, such as what is socialism, commodity economy, contradictions and plan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by stud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the Soviet Union. The exploration has a guiding role in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ism directly, while offering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of the lesson to create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O Shou-liang)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hangeover of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to deeply incorpo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coordinate urbanization, to innovate incessantly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to raise substantially productivity of labor. The most remarkable symbo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o raise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o realize the changeover of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land property ownership system being the foremost factor.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land property ownership system aims to solve two principal problems: firstly,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large-scale management of land; secondly,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foster a new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GU Yu-min)

**Dilemma in Developing Family Fa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s System in China:** To build the socialism neo-country in China and realize development harmoniously among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alization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t should put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e the rural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present, family-farm which happens i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s to make improvement in the rural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s theory. But as for the